

抗戰史研究的新趨勢——從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重看抗戰史」撰寫計畫談起

肖如平 浙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抗日戰爭史研究一直深受海峽兩岸的關注與重視，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重點和熱點。不過，由於種種原因，學界在抗戰史研究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也遇到了許多問題與挑戰。近年來隨著新資料的開放和利用，重新審視抗戰史已成海內外學界的共識。為此，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臺北國史館等學術機構都在進行新編或重修抗戰史的相關工作。其中，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組織中、日、美、英等國學者共同參與的「重看抗戰史」是一個頗值關注的撰寫計畫。該計畫自 2012 年 8 月正式啟動以來，已先後舉辦了三次工作坊，《重看抗戰史》上冊也將在臺灣和香港兩地正式出版。就「重看抗戰史」計畫的運作而言，基本上反映了當前學界在抗戰史研究中的一些新趨勢。

一、多國與多種新史料的利用

長期以來，學術界雖然非常重視抗戰史的史料發掘和利用，但也存在不少問題。一是因許多核心檔案資料尚未開放，尤其是重要歷史人物的檔案資料的缺失，使抗戰史的研究難以「現身說法」，甚至對中國政府在抗戰中的許多重大決策無法深入釐清。如蔣介石與日本的秘密交涉，原本資料絕少，如果沒有日記等私密資料，根本就無法深入探析。二是由於種種原因，抗戰史研究存在史

料來源和史料形式的單一性。例如有關七七事變、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中日兩國學者大都傾向於使用本國的史料，較少或甚至沒有使用對方的史料。而在探討抗戰時期的外交關係時尤其需要使用多國和多種新史料。就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中英關係而言，中英兩國不僅在歐亞戰略、爭取美國軍事援助上競爭激烈，在緬甸戰場、修訂新約、對華貸款上存在分歧，而且在印度、西藏問題上還互相牽制，關係極為複雜。如在研究中僅僅只使用中方資料，或者重點使用中方資料，肯定很難得出客觀公允的結論。

近年來，隨著海峽兩岸和海外機構大量重要檔案史料相繼解密、開放與出版，使抗戰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早在上個世紀，大陸學界就已經出版了多種有影響的抗日戰爭史著作。然而，由於未能充分利用《蔣檔》，再加上蔣介石日記也尚未開放，因而在論述蔣介石與抗戰的關係時，基本上認為蔣介石是消極抗戰，甚至有著作認為蔣介石在抗戰期間是「假抗日，真反共」。然而，隨著《蔣檔》的廣泛利用，以及蔣介石日記的開放，蔣介石與抗戰關係的研究有了全新的突破，「從過去主要利用間接史料，隔靴搔癢，轉為利用直接史料，從蔣介石不在歷史現場到蔣介石在歷史現場。」（註1）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在史料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胡佛檔案館珍藏大量中、美、英、蘇等國有關二戰時期的檔案資料，以及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誠、

陳光甫、張嘉璈、史迪威、陳納德等諸多中外名人檔案，加上日本、美國、英國學者的參與，日本外務省和防衛省的檔案資料、美國外交檔案、英國國家檔案資料均能相對充分地加以利用。多國與多種第一手史料的廣泛利用，成為「重看抗戰史」撰寫計畫的一個重大優勢和特色。新史料的廣泛運用，必將使抗戰史中諸多重大問題的決策得以釐清，其立論亦將更加客觀和符合歷史事實。

二、國際視野下的抗戰史

要做到國際視野，除資料的國際化外，至少還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研究者的國際化，即抗戰史的研究者應該是多國學者的參與和合作，至少應該是多邊合作。以往由於受政治、經濟和學術環境的影響，國際合作難度較大，但近年來這些制約因素已基本不復存在，完全有條件和能力推動和實現國際或多邊合作。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主持的「重看抗戰史」撰寫計畫，邀請日本東京大學的加藤陽子教授、日本防衛研究所研究員岩谷將研究員、英國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英國牛津大學米德（Rana Mitter）教授、上海復旦大學吳景平教授等十幾位學者參與工作坊或計畫的寫作。之所以邀請中、日、美、英等國學者參加「重看抗戰史」工作坊，並共同參與計畫的撰寫工作，其一重要目的在於使該計畫具有國際視野。毫無疑問，由中外學者共

同參與，並不能說明該計畫一定具備國際視野，但至少能夠吸納各國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讓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能夠進行學術的交流與碰撞，以期獲得相對客觀的立論。例如在 2014 年斯坦福舉行的工作坊中，日本學者岩谷將研究員使用日本防衛省的檔案和蔣介石日記等資料，提出「七七事變是偶然事件」，日本雖有侵華意圖，但七七事變發生時尚無具體的作戰計畫。日本的戰爭假想敵是蘇俄和美國，對於中國只希望穩定東北建立滿洲國，在其他地方則利用軍閥割據的分裂形勢逐漸建立傀儡政府、實現控制。七七事變最終一發不可收拾，與中國情報部門的錯誤消息使蔣介石決策失誤有關。與會學者對這一觀點存在較大爭議。不過，就學術研究本身而言，有爭議反而更能促進研究的深入和客觀。另外，計畫負責人郭岱君研究員也曾率領研究團隊專程赴北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臺北國史館的專家與學者徵詢意見和建議。

二是要將抗戰史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進行研究。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密不可分，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是中、美、蘇、英等同盟國的共同勝利。抗戰史不僅僅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因而在研究抗戰史中需要跳出本國史的藩籬，將其放在國際格局下，尤其是要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討。而以往在研究抗戰史中，普遍存在以中國為中

心，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去評判是非。這種研究視角，自然有其合理性和正當性，但僅僅局限於此，則是遠遠不夠。因為僅僅從中國的視角研究抗戰史，無法讓世界認可，尤其是無法讓發動侵華戰爭的當事國日本口服心服地承認與接受。只有將抗日戰爭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研究，才能更好地運用國際法的理論和方法分析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如何打破「巴黎和約」所建立的凡爾賽體系、「九國公約」和「非戰公約」並走上法西斯主義道路的，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日本在東亞發動侵略戰爭的緣由與目的。同樣，只有將抗日戰爭史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研究，才能對戰時中國的軍事、外交做出更加全面和客觀的分析，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開羅會議、雅爾達會議、中蘇談判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中、美、英、蘇四國在會議和談判中所處的地位與角色。

三、放棄政治偏見，堅持「不黨不私」

毋庸諱言，抗日戰爭史研究長期以來之所以深受海峽兩岸的重視，其既有學術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正因如此，兩岸的抗戰史研究成果雖然層出不窮，但或多或少都存在為政治所左右的困惑。2005 年，大陸有學者曾提出：「抗戰史研究不能以偏糾偏」，「由於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的不同，兩岸學者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對抗

日戰爭的研究無論在選題評價方面，還是相關史實的闡述方面都有著很大的區別。大陸學者重在突出中共的領導地位和作用，多稱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而臺灣學者則強調正面戰場除太原會戰有中共軍隊參加外，其他皆為國軍所為。而敵後戰場也是國軍較中共軍打得激烈，作戰次數亦多。」（註2）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政治化的學術對立近年來已大為改觀，兩岸學者對抗日戰爭中諸多重大問題的認識越來越趨同。黃克武先生認為：「近年來在臺灣民主化、大陸改革開放的情勢之下，兩岸共識增加了許多，不再是黑白對立而沒有交集。例如抗戰正面戰場是誰打的、蔣介石的是非法功過等，都較以往有更多的共識。」（註3）可見，放棄政治偏見，對抗戰史的學術化研究具有非凡的意義。

2012年，郭岱君研究員在「重看抗戰史」撰寫計畫啟動之時提出要放棄政治偏見，堅持「不黨不私」的原則，即充分利用資料，盡最大的努力去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例如，對於抗戰初期的國共關係，「重看抗戰史」計畫認為南京失陷到武漢會戰前，是中國人心最齊的時候。那時中共和毛澤東支持蔣介石。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之後，中共甚至接受了1926年整理黨務案的全部要求，視蔣介石為全國領袖，願意交出中共的名單，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但由於蔣介石無法接受共產黨階級鬥爭的學說，因而拒絕了中共的建議。在中共軍隊收編問題

上，蔣介石缺乏全盤設想，試圖採取「先收編後消化」方法進行，未能獲得中共的信任。隨著國內外戰局變化，國共逐漸走上了摩擦的道路。（註4）又如在汪偽政權的研究上，內地的大部分學者還是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去研究，只有少部分學者從社會史和心態史學去探討。毫無疑問，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研究汪偽政權具有正當的合法性，畢竟汪偽政權給國人的道德與情感造成了嚴重的傷害。然而，七十年已經過去了，汪偽政權的研究畢竟不能一直停留在道德和情感的層面。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6月舉辦的「重看抗戰史」工作坊中，學者已不再完全從「倫理道德」、「民族大義」的視角去研究汪偽政權，而是將它放在當時國際國內的大背景下探討，對汪偽政權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建設也給予了比較客觀的評價。

四、加強人物研究，豐富抗戰史的細節

目前有關抗戰史的宏觀著作，往往缺乏對「人」的關懷，即使像蔣介石、毛澤東、汪精衛等這樣重要的人物，也都是從政策層面去寫，極少從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視角去探討，其他軍政要人則更少涉及。隨著新史料的開放和利用，抗戰史的研究，除了對國家、政府、階層、政黨、軍隊，以及戰略和政策進行深入探討和分析外，也應該加強對抗戰歷史人物的研究，以豐富抗戰史的

細節。其實，關於抗戰歷史人物的研究，學界已經取得了非常豐富的成果，除蔣介石、毛澤東、汪精衛外，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齡、白崇禧、何應欽、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王明、陳誠、湯恩伯、胡宗南、張治中、薛岳、胡適、翁文灝等等，這些人物都有很多現存的研究成果。如何將這些成果吸收並融入抗戰史的著作中，也是目前抗戰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

在 2013 年 2 月，「重看抗戰史」撰寫計畫專門對「人與戰爭」的關係進行討論，提出「重看抗戰史」應該加強對「人」的敘述，要把「人」寫進去，而不是機械的只談戰爭、戰略、武器。例如，汪精衛投敵的真實心態是什麼？日本與汪精衛之間是否只是簡單的主僕關係？汪精衛有多大的自主性？跟隨汪精衛投敵的官員們又是出於何種心態與目的？宋子文在抗戰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對抗戰做出了哪些貢獻？普通的中國人在抗戰中如何遷徙、生存和生活的？戰時知識分子、公務員的生活狀況又是如何？在南京大屠殺中，日本兵與日本國民的心態又是怎樣的？蔣介石與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等大國領袖間的又是如何互動的，蔣介石與毛澤東、周恩來、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陳誠等黨政要人之間有哪些合作與分歧。（註5）人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加強抗戰史人物的研究，不僅有助於豐富抗戰史的細節，而且必將加深人們對抗日戰爭的理解。

總之，從「重看抗戰史」撰寫計畫的運作中，可以看出近年來學界在抗戰史研究中的一些新趨勢。而這些新趨勢一定程度又反映出當前抗戰史研究的價值取向，即盡可能真實地還原歷史，並在歷史中學習、反省，避免重蹈覆轍。不可否認，「重看抗戰史」撰寫計畫也面臨多重挑戰。首先要統合來自各國學者參差不齊、立場觀點不一的文稿，既不違背作者意願又能與其他內容融為一體絕非易事。這也是「重看抗戰史」一再推遲出版的原因之一。其次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仍然是抗戰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面向，「重看抗戰史」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必將引起較大的爭議。再次是撰寫計畫與實際寫作之間也可能存在差距。儘管如此，由於「重看抗戰史」撰寫計畫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一定程度的確可以彌補兩岸抗戰史研究的不足。

【註釋】

1. 陳紅民、曹明臣，〈新資料與新觀念：蔣介石與抗日戰爭研究論述（2000-2011）〉，《抗日戰爭研究》，2012年第3期，頁158。
2. 曾業英，〈抗日戰爭研究不能以偏糾偏〉，《北京黨史》，2005年第6期，頁21。
3. 黃克武，〈民國史研究的現狀與幾點反思〉，《國史研究通訊》，第3期（2012年12月），頁40。
4. 〈郭岱君等人關於「重看抗戰史」會談紀要〉，2013年1月31日，紀要由郭岱君研究員提供。
5. 〈郭岱君等人關於「重看抗戰史」會談紀要〉，2013年2月2日，紀要由郭岱君研究員提供。